

# 试析王莽的理财思想

杨智杰

(石家庄经济学院 石家庄 050031)

**【摘要】** 本文结合西汉后期的时代背景对王莽改制所推行的理财措施、理财思想及其改制失败的原因予以分析和总结,使后人记取历史教训,正确认识制度演进规律,因时因地恰当选择理财政策。

**【关键词】** 理财思想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虽然政治情况和社会思想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发展情况,但经济发展对政治和社会思想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王莽思想的形成是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的。从经济发展来看,汉代自文帝以来,商业资本取得显著的发展。商人兼并农人而使农民流亡的事实,在彼时已发其端,到了武帝时,商业资本和奴隶经济更为发达了,土地兼并之风也随朝代推进而日甚,农民更加困窘。从宣帝到元帝、成帝和哀帝的六十多年间,水旱之灾史不绝书,社会危机严重。政治方面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外戚专政。外戚专政的结果是君主权势旁落,而权贵子弟骄奢专横,作威作福,也更加剧了当时政治情况的混乱。人们对当时经济和政治极度失望,因而强烈要求改革。王莽就是生在这个时代中的一个人物。公元八年,王莽继受汉家天下做了皇帝,国号为新。此后他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终归失败,但其中体现出丰富的理财思想,值得借鉴。

## 一、财政经济政策

**1. 土地政策。** 在王莽所推行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土地政策(史称“王田政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时,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王莽对此很不满意,对于佃农阶级所受的痛苦也非常同情。在新莽建国元年,王莽就下诏:更名天下田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根据这个诏书,王田政策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全国耕种的田地都归国有,不得私自买卖;②男丁八口以下占田不得超过一井即九百亩;③占田过限的人将余田分给宗族乡邻;④无田的人,政府给予田地,所谓“如制度”,大概是依一夫一妇田百亩的办法;⑤有田不到此数的,也应由政府补足;⑥现有的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违反上述规定者,将被流放边疆去。

王莽对此土地国有政策是认真推行的。由于这一政策的推行,导致“坐买卖田宅奴婢……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犯法抵罪之多,可以看出王莽对此政策执行的积极和认真,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旧习之积重难返。到了建

国四年二月(即公元十二年),在大臣区博的谏阻下,王莽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形下令允许田地买卖,违反规定私自买卖奴婢的也不再治罪。这个命令的颁布表明王莽王田制度改革的失败。

**2. 国营事业与平抑物价。** 史书上记载,王莽称帝后采纳大臣国师刘歆的建议,根据《周礼》实行六管五均政策,即开展国营事业与平抑物价。所谓六管政策就是由国家经营盐、酒、铁、山泽、五均赊贷、铜布铜冶等六行业,更详细一点说,就是不仅工业、矿业由政府经营,商业、借贷也归政府统一管理。王莽的六管五均政策在理论上本来是是很可取的,但在执行方面却存在缺陷。每郡所设执行这种政策的官吏有几个人,都是富商大贾,他们和地方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造假账,饱私囊,官吏因此而发财,人民生活则更加贫困,因此人民对这些政策是不满的。加之每项政策都制定了若干禁止违犯条文,如违犯政府命令,情形严重者将处死刑,这更助长了奸吏猾人侵害盘剥百姓,由此导致社会暴乱的危机愈来愈严重。

**3. 货币政策。** 王莽的货币政策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制定货币政策的目的在于使商人不再利用货币剥削农民,但因他所执行政策的谬误,最终导致了祸国殃民的恶果。

汉初货币,沿用秦制,以黄金和铜钱为通货。高祖以秦钱重(秦铜钱重量半两,即十二铢),不便使用,乃使人民铸造重三铢的荚钱。钱太轻了,物价不免上涨。到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改铸八铢钱,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改铸四铢钱,同时准许自由铸币。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将四铢钱改铸为三铢钱,此后屡有变迁,到建元六年,更铸五铢钱,并将货币铸造权收归政府。

在王莽改制之前,社会通用的货币就是五铢钱。王莽摄政时,改革以前币制,仿周钱子母相权之法,铸造大钱、契刀、错刀三种货币和原有的五铢钱,一共四种货币。王莽做了皇帝以后,因汉姓刘,而刘字有金刀,于是在新莽建国二年(公元十年),废错刀、契刀和五铢钱,改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称作宝货的新货币。所谓五物,是指金、银、铜、龟、贝;六名指金货、银货、钱货、布货、龟货、贝货;二十八品即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和布货十品。

由于这种货币制度过于复杂,人民使用时很不方便,所以在实际交易时,还多半使用原来的五铢钱,因违反货币管制命令而被治罪的,上自官吏,下到百姓,数不胜数。这种因推行货币政策而招致社会动荡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 二、以成本为核心的会计思想

王莽对成本问题十分重视,其成本观是比较深刻而系统的。在收购滞货的定价政策方面,他主张以成本作为定价的最低界限,这个观点到现代也未过时;在借款利息的确定方面,主张以成本为基础而在其纯利润中分割,体现了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在计算税(贡)方面,主张在扣除成本之后的利润中按一定的比率(税率)提取,这与现代的所得税计算极其相似;在经营专卖酒方面,除对酒的成本计算作了详细分析外还主张采用“除本分成”的办法,对纯利润进行合理分配,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王莽对盈利、成本、费用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仿效《周礼》中泉府实行赊贷的做法,进行了一段时间赊贷活动,贷款部分按经营盈利额收取利息。王莽道:“……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这一段话明确了一个贷款利息的计算公式:贷款利息=[全部收入-费用(包括成本在内)]×10%(以内)。

王莽所讲的“除其费”包括成本和费用两部分(如果没有其他税收缴纳的话),从全部收入中减去这两部分,得出经营利润。利率定为10%以内,利息多少以经营盈利额大小为转移。这个公式说明王莽对当时的会计是有所研究的。公式中成本与费用没有区分开,这不是王莽不懂,而是当时的习惯用语。如下例中他所讲的成本,又包括费用在内。“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在山泽地带,从事生产和经营山货、畜产品,以及家庭手工业、商贩等行业的是按照下列公式计“贡”:贡(税)=[收入-成本(包括费用在内)]×10%。

有关盈利、成本、费用三个不同概念,以及它们在官厅会计核算中的具体运用,虽然是王莽所推行的经济政策的产物,但它更清楚地说明王莽其人当时对盈利、成本及费用有了此较正确的认识。

尽管王莽执政只有十五年,但其进行经济改革的涉及面之广、改革项目之多、实施速度之快在我国封建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其中,对成本的认识和应用尤为突出,他在许多经济政策中都把成本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因素加以考虑,这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绝无仅有的。

## 三、失败原因分析

1. 王田政策不符合时代的要求。王莽的本意是恢复井田制度的,但在那个时代想恢复井田已不可能。井田制适宜在地广人稀或者国家规模较小时推行,如我国西周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其推行时机宜选择天下初定之时。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已使井田制度存在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但王莽醉心古制,仍然实行,忽略了时间性和空间性,因此王田政策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2. 制度和法令繁多。王莽以为制度是万能的,所以他集中精力于典章制度的规拟,从而导致法令繁多,人民无所适从,动辄得咎。而在一个松弛惯了的农业社会里,实在不宜于制定过多的法令。制度和法令都不是万能的,而王莽则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由于错误的认识,遂产生错误的行动,他当然是要失败的。

3. 赋税太多且取之太急。王莽曾创行许多新税,到末年,对人民征敛更甚。不仅税重,而且苛扰,六管五均之制,其用意本来是好的,但在这种制度下,取之于民的范围也很广。马端临批评王莽说:“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赊贷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尝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马端临的说法并不完全对,其实,王莽在租税政策方面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同时创立新税太多,而又取之过急,使百姓骤然感到租税负担的增加,产生对租税的反感,最终诱致了社会的暴乱。

4. 货币的复杂化和通货膨胀。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和价值的尺度,因其如此,它需要单纯划一,并需要有个健全的货币制度,那就是说,应当有种健全的本位币和简单合理的辅币。然而,王莽的货币制度却忽视了这一点。其设置的货币种类太多,太复杂,如此复杂的货币是不能充当交易的媒介和价值的尺度的。在这样的货币政策下,百姓当然更愿意使用当年的五铢钱,社会经济也就发生紊乱现象,终于演变为政治上的危机。此外,王莽推行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很可能是一种通货膨胀的方法。在王莽摄政和即位时,有许多制作和对外攻伐都需要巨额的金钱。这样的币制,当然可以适应王莽财政上的需要。当时通货膨胀的程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从“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和王莽死后社会恢复了物物交换的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5. 地主豪族的反对。王莽的王田政策,对豪族地主是很不利的,因而受到了豪族地主的强烈反对。譬如,起兵讨莽的汉代光武帝刘秀就是一个地主,追随刘秀起事和其他方面起兵讨莽的豪族地主很多。在我国农业社会里,地主的地位和力量正如工业国家中的资本家,如果在政治上得不到地主的支持甚至遭到地主的反抗,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就会动摇。这也是王莽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政府理财与会计控制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0607021)阶段性研究成果。

## 主要参考文献

1.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2
2. 班固. 汉书.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
3. 郭垣. 中国八大理财家. 重庆:史学书局, 1944
4. 林万祥. 成本论.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